

读《日本学者声明》有感

——从当前日本教育论战的缘由说起

毛 牛

新世纪前夕,朝尾直弘、安井三吉、古厩忠夫、笠原十九司等 50 位日本知名教授、专家共同发表《声明》,批判右翼“新历史教科书”编撰运动,强调:“我们特此向国内外表明,作为历史研究家和教育家,基于自己的良心,对这样的教科书登场深感忧虑。”

《声明》自 2000 年 12 月 5 日发表到今年 1 月 31 日,签名已多达 820 人左右,目前日本各地的集会与签名活动仍在继续。《声明》与目前的集会与签名活动,实质是将多年来的、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正义与倒退之重大论战,推向了白热化阶段。

中国史学、教育工作者十分关注日本的教育问题,坚决支持日本专家和朋友们出自“良心”的声明与签名活动,坚决维护中日关系正常、健康的发展。

《声明》在回顾 19 世纪以来近百年的对外侵略历史的基础上,揭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,由日本“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”等右翼组织发动,编出“白皮纸本”教科书多种,传播甚广;其要害问题是:“第一,是把《记》、《纪》的神话传说当作真实加以记述”,要求废除公历纪元、以神武天皇即位日为建国纪念日,等;“第二,是将日本近代连续发动的战争正当化,将太平洋战争描述为亚洲解放战争”。

上述《记》、《纪》即成书于公元 8 世纪的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

纪》，是奉当时皇室之命编撰的官方典籍，记录有关于天皇家族的神话传说。但在近千年封建的幕藩时代，天皇权威旁落，只维系了名义的存在。直到 1868 年明治维新，以“王政复古”形式重建天皇制国家，才又恢复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神权地位。

天皇制在近代日本的发达史，是一部军国主义发展史、近百年对外侵略战争史。天皇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构件，理应接受审判和处置。但由于战后出现了中国内战、世界冷战等特殊局势，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管制政策，并于 1951 年主导、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。于是，天皇制得以保留，军国主义未受到足够清算。

虽然从总体上看，由于进步与正义力量的作用，战后日本的史学、教科书的主流能够基于史实，客观记述对外侵略战争的创伤和教训，并对军国主义进行批判。但是，不彻底的战后管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变化，不能不在教育问题上打下深深的烙印。按日本进步学者 义文等人的研究归纳，在教育问题上，战后迄今共有三次大的历史性倒退事件。

首先在 50 年代中期，日本经济逐步好转，右翼势力随之高涨。文部省强化对于教科书的审定，提出要“把战争写得光明一些”。由右倾化的政治力量主导，教科书被大面积歪曲，出现了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等多种翻案论述，形成为教育界歪曲历史长达 20 年的“冬天时代”。

这一黑暗倒退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批判，其间 1965 年文部省审定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，以其记述“南京大屠杀”等日军罪行，判为不合格。家永三郎毅然走上法庭，坚持长达 32 年的诉讼，并于 1997 年取得了部分胜诉。由于家永三郎诉讼案件及其他进步因素推动，到 70 年代中期，教科书的记述有了改善，南京事件等概念又出现在大部分教科书中。

80年代初期文部省再度强化教科书审定,要求把“侵略”改写为“进出”等其他词语,出现第二次大倒退。由于韩、中等国及日本国内进步学者的抗议,日本文部省不得不表示教科书审定制度要注意与“近邻各国”协调,相关侵略史实被重新记述。如1984年初中、1985年高中课本对“南京大屠杀”有了记录,1994年高中、1997年初中课本对于七三一细菌部队有记录,还有1997年家永三郎诉讼判决等。总之,到80年代中、后期,教科书又有了合符史实的改善。

但90年代以来,有所澄清的历史教学方向,再度发生逆转,并逐渐形成为目的的第三次、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倒退。其直接原因是1993年8月细川护熙首相发表谈话,确认其战争性质为“侵略”。日本右翼政治家随即组织“历史研究委员会”,连续召开约20次“研讨会”,集结研讨文章于1995年出版《大东亚战争的总结》,全面否定战争历史的侵略性质。与此相配合,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先后组织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”、“编纂新历史教科书之会”等右翼团体,编纂出版反对“自虐史观”,宣扬“皇国史观”、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的所谓新教科书,企图于2002年让全国正式采用。

该类新版教科书中,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,如“南京大屠杀”、“慰安妇”、“三光作战”等内容被大幅删除。日本古代的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传说,被当作史实向青少年灌输。据统计由“编纂新历史教科书之会”1999年10月发行的试用版《国民的历史》,已经卖出72万余册;有的由右翼财团资助免费散发,或印制普通市民喜爱的漫画形式,严重误导了青少年的思想认识。

这次教育逆潮的泛滥,还得自政府机关的主导与推动。文部省1998年12月新颁布的“学习指导要领”,确认要“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,培养作为国民的自觉”,为右翼新教科书开放绿灯。

文部省还决定,以“君之代”和“日丸旗”为“国歌”、“国旗”,要求在中、小学每天唱“国歌”、升“国旗”。“君之代”和“日丸旗”曾作为军国主义时代法定的国歌和国旗,是日军践踏东亚国家的重要道具。它们随旧《帝国宪法》废除而被废除,新的国歌和国旗必须由人民根据民主原则重新议定。“君之代”基本内容是宣传天皇万世一系,是神的化身。再度确认“君之代”和“日丸旗”为国歌、国旗并在学校使用,只会加固“皇国”观念,有利于右翼及新军国主义势力。所以,日本的教育问题再起风浪,日本政治界、官方负有主要责任。

众所周知,教育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行动,除了学校的知识教育,它还具有引导、改变或统一社会道德、思想、舆论及行动等重大功能。早在明治维新时期,由天皇颁布《军人敕语》,通过灌输对天皇的绝对服从精神,将军人训导为绝对驯服的战争工具。又颁《教育敕语》,以忠君爱国为教育最高宗旨,并强令师生定时敬拜、捧读《教育敕语》,以完成军国主义的教育目标。天皇的权威作用直接为战争国策服务,人们不会忘记,通过 1940 年的所谓天皇纪元 2600 年庆祝大典,直接推进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大政翼赞会及太平洋战争体制的确立。

教育还被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军曾指责北平地区学校实行“排日教育”,向中国政府提出“修改学校教科书”的无理要求。1937 年日军全面侵入中国,一方面以武力摧残中国的教育事业,如对天津南开大学的野蛮轰炸,霸占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校舍作为军用。当时中国约有高校 108 所,被迫内迁或停办 94 所。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开办殖民学校,尤重视对少年儿童的奴化教育。在华北,日军规划开办“中心小学”,目标是“在二十年内造成 16 万模范的小学生,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,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”。在东北地区则由“满洲

国”颁行“教育方针”，要求“涵养振作忠孝仁爱、协和奉公之精神，训育忠良之国民”。

正如《声明》所指出，基于教育的培训接班人的重大功能，“新历史教科书”如果通过文部省的审定，取得2002年的合法教科书使用资格，将进一步误导年轻一代，影响未来日本的政治走向。日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，其核心目的是要否定战后民主改革的基本原则，企图实现其现实的新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。

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，日本的教育领域始终交织着战争与和平、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。坚持客观、正义立场的日本教授、专家和朋友们正在进行坚决的斗争。家永三郎坚持32年的诉讼，以及现今50位知名教授、专家的联合声明或广大正义人士的集会与签名活动，都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。

孙中山先生倡导过和平合作的“大亚洲主义”，被日军的枪炮打破；值此新世纪开端，我们仍然怀抱希望。日本史学、教育界的正义力量，终将主导教育的发展方向，保障东亚各国和平共处。一个对于历史做过认真反省的日本，与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，完全可以公正、友善地携手合作，再造太平洋时代的东方文明。

(作者毛牛，1949年生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

(责任编辑：荣维木)